

乙型肝炎 的辨症施治

朱曾柏 著

Diagnosing and Treating
Hepatitis B On the Overall
Analysis of the Illness

6.4

学苑出版社

(京)新登字 151 号

乙型肝炎的辨症施治

*

主 编 朱曾柏

责任编辑 白 波

装帧设计:朱美玉

* * *

学苑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海淀区万寿路西街 20 号)

邮政编码:100036

武汉大学出版社印刷总厂印刷

* * *

850×1192 大 32 开本 4.5 印张

1996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

印数:0 001—3 000

ISBN 7—5077—0691—5/R · 118

定价: 18.80 元



湖北中医学院教授
美国中华医学会高级顾问
武汉疑难杂症研究所所长

朱曾柏教授

朱曾柏教授主要医学专著：

- 论中医痰病学说
- 中医内伤热病学(两种版本)
- 中医治疗慢性病毒性肝炎(两种版本)
- 中医痰病学(三种版本)
- 朱曾柏疑难杂症经验集
- 朱曾柏治癌病案选
- 乙型肝炎的辨症施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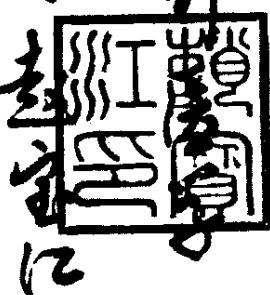
朱氏抗衰(老)9号(A、B)型

朱氏乙肝散(A、B、C)型



遇
先
送
福

校園勇士相競授系
吉芳乙財出版
五十五年八月



武汉市市长赵宝江题

作者简介

朱曾柏教授医学理论精深，临床经验丰富，学术思想活跃，并注意吸取西医西药的长处，治疗疑难杂症、危急重症独辟蹊径，富有独创性。朱教授从事教学、医疗、科研40余年，学验俱丰。1993年以前，公开出版的医学专著有：《中医疫病学》（三种版本）、《中医内伤热病学》（二种版）、《慢性病毒性肝炎的辨证施治》（二种版本）、《朱曾柏疑难杂症医疗经验集》、《朱曾柏治癌病案选》等9部医学专著，1995年一年间同时出版了《中医疫病学》（即第四版中英文对照本）和《乙型肝炎的辨症施治》二部专著，共约200万字。朱教授独创的（广义）中医疫病学，在中医学领域中开拓了先河，为治疗疑难杂症、危急重症以及中西医在高层领域中的结合，提供了新的思路，使老树发新枝，拓展了许多药物的药用范围。朱教授还发表了有自己见解的中医药论文200余篇，国内外先后有20多家报刊、杂志、电台、电视台介绍过他的学术思想、医德医术和他研制的多种新药。如1993年2月，新华社以《没有围墙的医院》为题，报道了朱教授义务函诊20000余人次，免费赠送给疑难重症病人各类药物30000余人次。《人民日报·海外版》1989

年2月4日以专访的形式，发表了题为《勤恳掘宝人——访中医癌病学专家朱曾柏》的文章；1992年12月，加拿大多伦多环球出版有限公司以《疑难杂症的克星》为题，介绍了朱教授独特而渊博的学术思想和高尚的医德医风。1993年8月《人物春秋》以《精湛的医术 卓越的疗效——记海内外著名中医疑难杂症肿瘤专家朱曾柏教授》为题，以10000余字的篇幅介绍朱教授高尚的医德，精湛的医术，以及为国际友人治病疗疾的事迹。此文1994年被湖北科技出版社收入高校文科教材中。

1993年7月在美国洛杉矶召开的首届国际中医药学术交流会上，朱教授荣获三项国际金奖，并受聘为美国中华医学会高级顾问而享誉国内外。

1994年在美国拉斯维加斯召开的首届世界传统医学大会上，《朱曾柏治癌病案选》一书，获二等金杯奖。

1995年在东方医学国际研讨会上，朱氏乙肝散（A、B、C型），朱氏胃药（A、B型），朱氏抗衰（老）9号（A、B型），均获金奖，同时，美国中华医学会授予朱曾柏国际名医奖。

美国中华医学会供稿
U.S Chinese Medical Association

目 录

一、概述	(1)
二、借助中医关于肝的生理、病理学理论， 开拓思路，提高治疗乙肝效应	(10)
三、为什么当前治疗乙肝仍须要借助于中医 辨症施治理论体系？	(19)
四、湿热之毒中阻症治 (附：经验方四则)	(27)
五、肝郁脾陷毒伏症治	(35)
六、血脉瘀滞毒伏症治	(38)
七、痰毒兼瘀症治 (附：简易方一则)	(41)
八、气虚夹毒症治 (附：简易方一则)	(45)
九、肝肾阴伤夹毒症治 (附：简易方一则)	(49)
十、坚持小剂量服药，扶正解毒，促使乙肝 病毒表面抗原 (HBsAg) 转阴	(54)
十一、降酶治法数则	(63)
十二、转氨酶长期不降 (或反复波动)，必须	

做到以下几点

- (附：从五味子降酶看中医辨症用药
及中药气味功效的特色) (69)
- 十三、正确运用活血化瘀药 (75)
- 十四、正确运用疏肝行气法（药） (78)
- 十五、控制肝痛、肝大，标而本之，促使乙
肝向愈 (80)
- 十六、肝大、肝痛外敷法二则 (90)
- 十七、乙肝伴脂肪肝的治疗
(附：外敷法二则) (91)
- 十八、乙肝并发肝硬化之防治
(附：经验方三则) (93)
- 十九、坚持服药，控制失眠、头晕，促使病
情向愈 (95)
- 二十、清热解毒法（药）可贯彻乙肝治疗的
全过程 (97)
- 二十一、保持精神豁达愉快，注意劳逸适度
..... (101)
- 二十二、少房事，固肾精，提高机体免疫功
能，俾乙肝愈而不发 (107)
- 二十三、注意饮食，配合食疗 (111)
- 二十四、注意药物剂量以及煎药、服药方

法，降低药费	(114)
二十五、慢性乙肝病人的药量要轻	(118)
附录：《中医杂志》1982年第9期刊载的论 文《慢性病毒性肝炎的辨证施治》	…	(121)

一、概述

我国是一个大国，乙肝患者较多，病人和无症状病毒携带者，总人数在一亿二千万以上。

乙肝多发于青壮年和青少年，加之目前尚缺乏理想的治疗方案和特效药物，因而使得许多乙肝患者及其家属忧心忡忡，甚至惶惶不可终日（这当然是不必要的）；其中不少人难以坚持正常工作，或失去了出国深造和继续攻读的机会。有些大酒店、大宾馆的先生、小姐因乙肝而丢掉了“饭碗”，失去了非常惬意的工作。不少祖国的花朵，由于感染了乙肝病毒而不能入园、入托！控制人口增长，一对夫妇只生一胎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孩子感染了乙肝，做父母的心情抑郁、沉闷，是不言而喻的！有一些如胶似漆的恋人，一方如果患乙肝长期医治无效，另一方又恐惧乙肝之心理太过，也只好分道扬镳。我亲自见过三对自幼青梅竹马，从初中到大学一直情趣相投，情笃似漆，而且都有很强的事业心的恋人，由于一方乙肝病毒标记物长期不转阴，最后只好含泪各奔东西！（我无能，这三位带毒者都是经过我治疗很久而未能使乙肝表面抗原阴转者）上述约略列举的情况，并

非引用的资料，而是笔者经常见到的实例。因此，国人将乙肝称之为“国害”，是不无原因的，也并不为过！由于医治不易，故又有人称乙肝为世界医学三大难症之一。

有鉴于此，具有优良传统和以为人民防病治病为宗旨的中国医生，特别是中医和中西医结合的医生，发挥中医中药的优势，克尽职守，尽心尽责，竭尽全力地为遏制和消灭这一“国害”作了大量工作。仅近十年来先后出版防治乙肝的专著就不下十五种之多（尚有少数内部印行的资料）。毋须讳言，这些论著中，虽各有偏颇，但见仁见智，各有千秋，都为防治乙肝作了应有的工作，有些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医药学在治疗难治之症中大大地向前发展了一步，写下了无可磨灭的光辉一页。

世间上的许多好的、有实际价值的东西，几乎无一例外地要经过长期和反复的实践而逐步形成的过程。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是难以存在的。所以，写这本书的时候，必须将我治疗肝炎和写前两个本本的经过，约略地有所言及。

“文革”期间，我带学生在中国大陆湖北省的荆州、黄冈地区一带临床实习。当时病毒性肝炎发病率颇高（但乙肝尚少），根据这些地区病患者的病情，按

照中医辨症施治的原则，以解毒、化毒为主，设计了几组主要方剂及其加减药物。经系统治疗 110 例，效果较好。带队的负责人和学员中热爱中医的学生（由于学生全部是部队保送来的，复因工作环境和工作条件等等因素，很多人在中医学院学习，而对中医治疑难杂症则疑信参半，甚至根本不相信中医）推波助澜，要我将这 110 例肝炎资料条贯成文，作为带学生临床实践的经验体会。“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我只好照办。约莫两个月后，学员集中到湖北省浠水县召开开门办学经验交流会，领导叫我向学员讲讲“中医痰病学”，而油印的“病毒性肝炎的辨症施治”资料也流散到学员中去了。有几位“突出政治”可爱的“学生”，说我业务冲击政治，要我检讨，并说要“深挖思想根源”。我不悦，硬是不检查，我奉命作文，且字里行间尽量引用毛主席语录，何挖之有？几天前说是经验要我写，且交流，而须臾之间却要检讨？“深挖”？我生性拗犟，加之沾老祖宗的光，出身特好，气血之怒不可有，礼仪之怒不可无，于是干脆将资料作了一些文字上的润色，投寄到广州中医学院主办的《新中医》。《新中医》加了几条“语录”之外，一字不改，1966 年第 4 期全文发表，并且还寄来了一笔可观的润笔费。这样，问题就更加严重了，似乎是我有意对抗“革命群众”的

意见，坚持业务冲击政治的错误。

军宣队黄某，为了使我能经常为部队首长看病，也为了息事宁人，提前将我调到湖北省革命老区麻城县一个山沟里去“开门办学”。这就是说我在开门办学的第一线，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与革命的学生“同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此事始告平息。这里有必要提到一件十分有趣的往事：1978年8月，全国中医杂志的主编或负责同志，云集于群山滴翠、秀色可餐的莫干山开会，我也是与会者之一。因为“四人帮”倒台，大家心情愉快，从总结工作经验、办刊方向、以及如何提高中医中药论文水平，乃至大劫之后的工作情况、身体状况等等，无拘无束，畅所欲言。闲谈间，广州《新中医》的李明宗主任讲了一件使我感到茫然的事。他说：朱老师，你真胆大……。你是知识分子，又是大学教师，应该善于审慎从事……云云。我听后如坠五里雾中。我出身清寒，学识浅陋，加上长期在文人相轻的环境中工作，故一向谨慎，对于同道中的许多人，我都视为师长，何来胆大为？李主任说，我讲的不是这些，说你胆大，是指你居然收下了我们寄给你的稿费……。（当时北京还有一家《新医药学杂志》，发表文章后，是不发稿费的，大概是“不要金钱挂帅”。我发表一篇《几种痰病的辨证施治》的长文，

只收到编辑部送来的一堆杂志) 李主任接着说：那个时期，不少作者都将稿费退回，并且在留言栏里写下：“要将革命进行到底，不要金钱挂帅”等“革命”口号。此事成了我在探索防治肝炎过程中无法忘却的一件趣闻！每忆及此，便历历在目。

《新中医》是当时中国唯一的一家中医药综合性刊物，所以发行量极大，基层中医药人员差不多都订有这种杂志，并且还有不少爱好中医药的朋友也订阅。我的上述论文发表后，1966年和1967年二年间，平均每天都要收到全国各地求医问药的信函和电报至少30份，总数近20000份。这近20000人次的函件，地域分布极广，遍涉我国东南西北中（并有港、台患者），气候有干、湿、凉、温之异，年龄性别职业，则有男、有女，有小孩、有孕妇，有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不少患者在他们求医问药的信函中（有的患者一封信长五、六千字，甚至更长），介绍了他们服什么药效果好，哪些方药对乙肝病毒标记物转阴有效；服什么药效果不好，机体不适，甚至病情加重等等各种情况（包括某些民间的土方土法）。这些大量的反馈信息，对我启迪很大，学到了许多书本上根本无法学到的东西（应该说是学问），为我进一步调整治疗乙肝的思路和方药，确立解毒扶正、

扶正解毒治疗则提供了许多宝贵经验。《中医杂志》1982年第9期上发表的《病毒性肝炎的辨证施治》一文（约10 000字），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补充、修改写成的。

《中医杂志》是中国中医药学术水平最高的中医药综合性刊物，发行量大，且具有较高的权威性，许多论文的内容经得起检验和重复。所以求医问药、索方疗疾的肝炎患者也与日俱增，按图索骥而愈疾者，也时有所见。学院收发室的同志特为我设一装信的口袋，即肇始于此。这里要特别感谢湖北中医学院领导的是，学院领导经过研究，允许我每月用公款发信100至150封。此事基础部谭主任告诉我之后，我非常感动，在办公经费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允许一个职工每月用公款发150封信，这无疑是为教师办的一件实事！但我认为，领导的支持和关心，势必影响很多人的情绪，影响团结！这样反而失去了领导关心、支持的初衷。安定团结第一，稳定第一，所以我始终未用公款发一封信。走笔至此，只有再向学院道一声感谢，遥向黄鹤三鞠躬（我写此书时已移居中国广东省珠海经济特区）！

为了攻克乙肝，1984年10月在大连召开了“全国中医肝病攻关学术会议”。我在大会上宣读了论文，

并是此届会议的主持人之一。在这次会议上，拜读了不少各具特色的文章，向与会同道学习了许多宝贵经验，受益匪浅！1985年《中医杂志》组织“乙型肝炎诊治专题笔谈”，邀我撰文参与讨论，文章发表于《中医杂志》1985年第4期上。鉴于上述情况，不少同志建议我写个专辑，使中医中药能更好地在防治肝病上发挥其优势和特色。这些意见和建议，中恳、诚恳，有些信函透过纸背都看得出在为中国医药学而呕心沥血。这就是我写第一本《中医治疗慢性病毒性肝炎》的思想基础和具体环境。此书问世后，颇有“纸贵洛阳”的气氛，20000多册，不久即销售一空。1990年10月作了少许补正修改，第二次印行，很快又售完。当然，书的印数多，不一定书的质量就好。但由于书名用了西医的医名（即“慢性病毒性肝炎”），倒是招来了两位老先生的异议，说中医不该用西医病名写书云云，射人之词殊多。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由他去吧！

书，人人会写，但出版后所引起的作用和反映并不都是一样。我的书如何？不敢妄言。思之再三，我想举个例子：有位研究生，毕业后没有到分配单位工作，而是在我国北方一个环境优美的城市搞了一个乙肝研究所，未及半年，病床已发展到30张，盈利30